

走下神坛的《赵氏孤儿》

■ 刘红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 《赵氏孤儿》脱胎于《左传》中的一个史实，到司马迁作《史记》时演变为一个故事，之后又分别经过纪君祥改编为元杂剧和近代搬演上京剧的舞台，直到最近的陈凯歌导演为电影，每一次的变身都迎合着时代的潮流，或者说是不同的时代需要对这同一个故事作出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在解读不同时代的《赵氏孤儿》时，毋宁说是在解读不同时代的社会构造和人心人性。

[关键词] 《赵氏孤儿》；《左传》；《史记》；神性；陈凯歌；人性

《赵氏孤儿》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经典剧目，一直保留在各种地方戏和国粹京剧当中，在公众的接受中，它是一个复仇故事，类似于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一个家庭全家被杀，侥幸留下一个婴儿，婴儿长大后手刃仇人，为家人报仇雪恨。陈凯歌导演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延续的仍然是这个模式，只不过用更多的偶然性情节促成了复仇事件的发生，把戏曲中“侠士”形象的程婴塑造成了一个普通人，为特定的情境所迫不得不救孤、养孤、复仇。从前那个具有“神性”的侠士程婴变成了一个具有更多“人性”的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有点胆小懦弱的平庸男人。

一、史实解读

在历史上，春秋赵氏确有孤儿，就是赵（文子）武，在赵氏家族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赵武的确是赵氏家族在晋国境内遗留的惟一血脉。事情要从周王朝建立时说起，周王朝建立之后，并没有形成疆域广阔的统一国家，它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方式，就是在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众多的统治据点，各诸侯国的封邑都不大，领土也不相连，赵氏是其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史记·秦本纪》有记载“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到后来，周王朝逐渐衰微，各个诸侯国日益强大，原本就不曾统一的土地被诸侯国瓜分殆尽，诸侯国也从最早的供奉和效忠王室，转而开始自己的霸权之争，在这个争斗中，赵氏之国被吃掉了，晋国则在争霸战中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具有公认的盟主地位。赵氏后裔在经过各方面的衡量之后，毅然投奔了晋国，这位投奔而来的人就是赵武的曾曾祖父。

赵氏来到晋国之后，成为晋国的辅佐之臣。在赵武的曾祖父赵衰年轻时，晋国出现了五子争夺君位的局面，赵衰靠着自己的政治眼光选择了公子重耳，并随重耳出逃到外国，与其共患难。后重耳归国，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对赵衰从亡期间对自己的鼓励支持和归国后的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非常感激和满意，甚至在归国之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赵衰，同时赵衰的政治地位也稳步提高，由此奠定了赵氏在晋国飞黄腾达的基础。

赵衰辅佐了晋文公和晋襄公，在晋襄公时去世，他的儿子赵盾登上了历史舞台，赵盾刚刚登上晋国正卿的位置不久，晋襄公就去世了，赵盾拥立了新君晋灵公，晋灵公当时还在怀抱之中，赵盾便理所当然地代理了国内的朝政，诸侯国会盟时，坐在盟主位置上的也是赵盾而不是晋灵公。功高震主，赵盾的专权导致了长大后的晋灵公的不满，曾经两次要杀掉赵盾，第一次是派杀手去刺杀赵盾，没有成功；第二次是摆“鸿门宴”，结果又被赵盾逃脱了。逃出来的赵盾直接投奔别的国家避祸去了，他的同族兄弟在这期间弑杀了晋灵公，赵盾才得以再度返回晋国，继续执政，这时在位的是晋成公。之后的赵盾没有再遇到过什么麻烦，直到他去世。随后晋成公也去世了，晋景公登上宝座。致使赵武成为孤儿的事件就发生在晋景公在位期间，历史上称为“下宫之难”。

据专家考证，“下宫之难”发生时，不仅赵盾去世很久了，就连赵武的父亲赵朔也已经去世了，庄姬的“庄”即是赵朔死后的谥号。所以不会有陈凯歌影片中赵盾父子同上金殿的场面，也没有赵武为遗腹子的事情，遭到族诛时，赵武是个七八岁的孩子，而不是初生婴儿。“下宫之难”之所以发生，源于内外的两重矛盾，在外，晋景公拥有和晋灵公一样的心思，君臣矛盾日益激化，却苦于无从下手；在内，赵朔死后，赵武的母亲，也即庄姬喜欢上了赵朔的叔叔赵婴齐，并与之私通，庄姬出身公室，身份高贵，赵氏家族奈何她不得，就驱逐了赵婴齐。当时，赵婴齐是赵氏家族内最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人，赵婴齐不在，就给了对赵氏家族长期专权不满的晋景公和其他家族以打击报复的可乘之机，于是赵氏遭遇了灭顶之灾。^[1]

当时的赵武，一是由于年纪小，二是由于母亲的身份比较特殊，躲过了这一劫，随同母亲回到晋公室的宫中，并在宫中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因梦得病，梦中有一个厉鬼，顿足捶胸地向晋景公哭诉，说自己的孙子被杀，要求晋景公主持公道。晋景公又惊又惧，导致疾病缠身，占卜之后说那个厉鬼是赵武的先人，于是晋景公就和韩厥商量要重新立赵武为赵氏的继承人，并且归还了赵氏之前

所拥有的封地。历经大难的赵武在复立之后非常的低调，勤恳辅佐晋公室的同时悉心培养自己的子孙，并选择有能力的子孙继承自己的卿位，赵氏家族不久之后就再一次崛起，成为晋国举足轻重的世卿之一。到赵武的孙子赵（简子）鞅时，赵氏家族的势力已经可以和赵盾在世时的情形相媲美，于是赵氏开始谋划复立自己的赵氏之国，并且终于由赵（简子）鞅的儿子赵（襄子）毋恤完成了这一壮举，与晋国其他两个世卿大族一同瓜分了晋国的领土，建立了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从史实上来讲，如果说赵武有复仇之举的话，那也是针对的晋国公室，通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终于取代晋国重新拥有了赵氏之国。诛杀赵氏全族的主谋当然是晋景公，具体执行者史书没有记载，但绝对不是屠岸贾，因为据考证，在《左传》中没有任何关于屠岸贾和其家族的记载，《史记》中的屠岸贾除了做了诛杀赵氏全族这么一件坏事之外，也再没有出现过，包括他的整个家族。作为文学形象的屠岸贾很明显有着和赵盾不相上下的权势，如果他不是出身名门望族，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很讲究宗法门第的时代，没有世家大族的出身在背后作支撑，一个普通人绝对不可能拥有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资本，即使他确实有不同凡响的才能。那么结论就是，屠岸贾是虚构的。至于程婴和公孙杵臼，可能是赵氏的门人，曾经在庄姬带赵武回宫避难的过程中起到过帮助的作用，因为身份低贱，史书不予记载，但这只是一种推测，现在已经无从查考。

二、“神性”的赋予

史实的记载主要见于《左传》。《左传》中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只有很简短的两部分，见于《鲁成公·经八年》，分别是“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和“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乐、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蓄于公宫。以其田舆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功，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其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2]。

神性的赋予始见于司马迁《史记》的《赵世家》。在《史记》中，关于“下宫之难”有两次记载，都在世家卷，一次见于《晋世家》，其叙述的方式和简略程度和《左传》如出一辙；另一次见于《赵世家》，事件中已经有了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故事情节也更加饱满，类似于传奇小说的样子。《赵世家》中屠岸贾为了争权夺利想要除掉赵氏一家，并且在不通知晋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赵武是遗腹子的身份，随同庄姬逃入宫中，并在宫中出生，屠岸贾前去索要，是庄姬把他藏在裤裆中躲过了一劫；程婴和公孙杵臼以赵氏门人的身份出现，义无反顾要主动拯救赵氏孤儿，二人找了别家一个孩子藏在公孙杵臼处冒充赵氏孤儿，再由程婴去告发，从而救下赵氏孤儿，保存赵氏血脉；赵武随程婴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生病时，韩厥告诉他赵氏还有孤儿，晋景公于是重立赵武；赵武杀掉屠岸贾，为赵氏家族报仇雪恨；程婴随后自杀，以报答

赵氏之恩和公孙杵臼之死。

在《史记·赵世家》中，被充分地赋予了神性色彩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二人。他们两个具有“侠”的一面。“侠”是春秋战国时代比较普遍的一类人物，他们崇尚义气，遵守信用，可以不顾自身的安危去践行一个诺言，或者以死报答别人的知遇之恩。“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3]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侠义行为集中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场景是二人讨论死义和活义的难易程度，“公孙杵臼曰：‘立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4]在他们看来，以死报答赵氏的知遇之恩和活着养孤报答赵氏的知遇之恩殊途同归，都达到了“义”的目的，越是所遇者厚，越应该选择惨烈一点的方式。第二个场景是故事的结尾，“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盘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4]二人终于以义无反顾走向死亡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侠义之举，也使自身形象有了神性的光辉。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时期，那时的儒家礼法已经基本确立，当时的侠义人物和行为也已销声匿迹，但是出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对于流传下来的春秋战国侠义人物和故事并不陌生，而且出于个人的喜好，司马迁对于侠义人物和行为非常推崇，在《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就分别记录了一些侠士的行为和事迹，比如荆轲、曹沫、豫让、聂政等人。基于此，他在写作《史记·赵世家》时，毅然地抛弃了传统史家的视角，以一个带有崇敬心情的后人身份，在采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了这样一个充满侠义精神的悲剧故事。

再次更浓重地赋予赵氏孤儿中人物以神性色彩的是纪君祥创作的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剧中的整体情节与《史记·赵世家》基本相同，稍有变动的是屠岸贾为了搜捕赵氏孤儿而不惜下令诛杀全国的小儿，程婴不得不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来代替赵氏孤儿，这更使其增加了整个剧本的悲剧性，也使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更具有神性的光辉。

纪君祥，生卒年不详，据《录鬼簿》记载，他与郑廷玉、李寿卿为同时代人，活动时间应该在元朝初期，他自己很可能身历宋元两朝，亲眼目睹了蒙古族的入侵及元朝的建立。异族的入侵和统治，汉人社会地位的低下，文人的不得志和对宋朝的留恋，都使纪君祥和他的同时代人有着一种激烈愤懑情绪，这与剧中肯定为正义而自我牺牲和向邪恶势力复仇的精神是一致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就很赞赏元代杂剧能够“模写其胸中之思想与时代之情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无疑应该属于此等行列。

宋朝建立之初，开国君主为给自己正名，按照姓氏向上追溯的时候，就与春秋时期的赵氏发生了联系，认为那是自己的先祖。整个宋朝期间，与周边的辽、金、元有着

不断的战争，危急时刻宋朝皇帝想起了曾经救赵氏于危难之际的侠义之士程婴和公孙杵臼，并且多次给他们追封尊号，建庙祭祀，表彰忠义，同时也期待着还能有这样的人帮助宋朝的赵氏力挽狂澜于既倒。纪君祥在宋亡不久的元代舞台上演出这一历史故事，而且让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咏”，“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垂青史、万古流芳”^[5]等曲辞，在客观上与当时广大汉族人民普遍存在的反元复宋的思想情绪是相吻合的。

三、“神性”的解构

进入21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消费的时代、娱乐的时代、喧嚣而又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不相信崇高和人能够具有神性的时代，现代文学上的解构神性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新历史主义致力于寻求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认为历史的过程和结局充满了偶然和荒诞，历史的发展动力不是什么崇高伟大的理想，而是人性的卑琐欲望和邪恶动机。电影作品解构神性始于大话系列影片，但大话系列只是调侃，并不完全否定崇高和神圣的存在，而陈凯歌导演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在执著于人性化叙述的同时，则彻底解构了神圣历史人物身上的神性光辉。

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元代杂剧中人物善恶类型化的塑造方式完全不同，他试图在善与恶的大框架中为人物注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使他们在客观结果上具有善恶之分的同时，却展示着截然相反的个性特征。赵盾和赵朔的被杀并不完全无辜，他们权倾朝野、专横跋扈、无视君主、挤压群僚，连屠岸贾丧子的疼痛也不放过。屠岸贾受尽赵氏父子的挤压，在不得不吞掉晋王贪玩误射出的石子的同时，艳羡着赵朔的娇妻美眷，渴望着获得无限的权势。但他面对着赵氏孤儿却露出了慈爱的一面：带着赵孤在翠草丛中嬉戏，用男人的方式教给他成人世界的冷酷法则；在赵孤身陷敌阵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拨转马头去痛斩敌人；屡次可以杀死赵孤，但又屡屡手下留情。程婴的性格平常而又懦弱，他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因庄姬的信任不得不救孤；因孩子误抱而不得不以己子替孤；赵孤不愿意复仇他也就想放弃；最后一刻以自己的死换得了赵孤的复仇一剑。在剥去曾经具有的神性光辉，把程婴呈现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那个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佝偻着腰步履匆匆的程婴简直可以用卑琐来概括，相反，作为父亲的屠岸贾远比程婴阳光和成功。

影片中也有很多死亡和血腥：赵盾父子的死、庄姬的

死、程婴妻儿的死、屠岸贾的死和程婴的死。但是这么多的死亡却不再具有悲剧的惨烈和震撼，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理由死去，但复仇的主旨却渐行渐远，戏剧的巧合被呈现，剧本的线索却变得千头万绪，缺少了那种强大的力量：为了报恩而牺牲，为了牺牲而复仇。鲜血并没有减少，但赵氏孤儿复仇的原动力却被减弱了。屠岸贾这个杀人如麻的冷血狂徒变得有血有肉了，而赵氏孤儿终极目标的实现更加艰难：这个比他亲生父母更加让他留恋的人居然是他的仇人，他如何痛下杀手？不过，结局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因为屠岸贾杀了程婴，所以为了这个切实的更亲的人，为了给他爱的儿子报仇，赵孤杀掉了次一级的屠岸贾。理由显得有点荒谬，那三百多家人的惨死没有唤起赵孤的痛苦和仇恨，倒是程婴的涕泪横流更能刺激这个少年的一时鲁莽和冲动。但如果屠岸贾没有杀掉程婴，如果程婴没有用生命做复仇烈火的引子，大概赵孤的复仇也就付诸东流了。

观看完影片，留在脑海里的只是几个惊艳的片段，仅仅都与造型或者背景有关：赵朔与庄姬夫显妻贵恩爱无比又高贵显赫地坐在马车上；在阳光下，真正的赵孤假的程勃穿上铠甲那英姿勃发的身影，让众多观众唏嘘青春的逼人气息，也让多疑的屠岸贾恍然若失；那场宫廷政变的打斗更是震人心魄。在导演追求“人性化”的叙述下，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中里面的程婴有点近乎疯狂地救孤、养孤和复仇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个历史人物身上曾经激励过无数人的神性特质在我们这个不再相信崇高的时代，已经变得遥远，人格也变得虚幻，所以《赵氏孤儿》终于走下了神坛，成为大众娱乐餐桌上的一盘菜。

[参考文献]

- [1] 白国红. 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07-120.
- [2] [春秋]左丘明. 春秋左传校注 [M]. 长沙: 中华书局, 2006: 463.
- [3] [汉]荀悦. 前汉纪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45.
- [4] [西汉]司马迁. 史记·赵世家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783, 1785.
- [5] 戚晋叔. 元曲选 [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1485.

[作者简介] 刘红娟(1976—)，女，河南西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